

翰林外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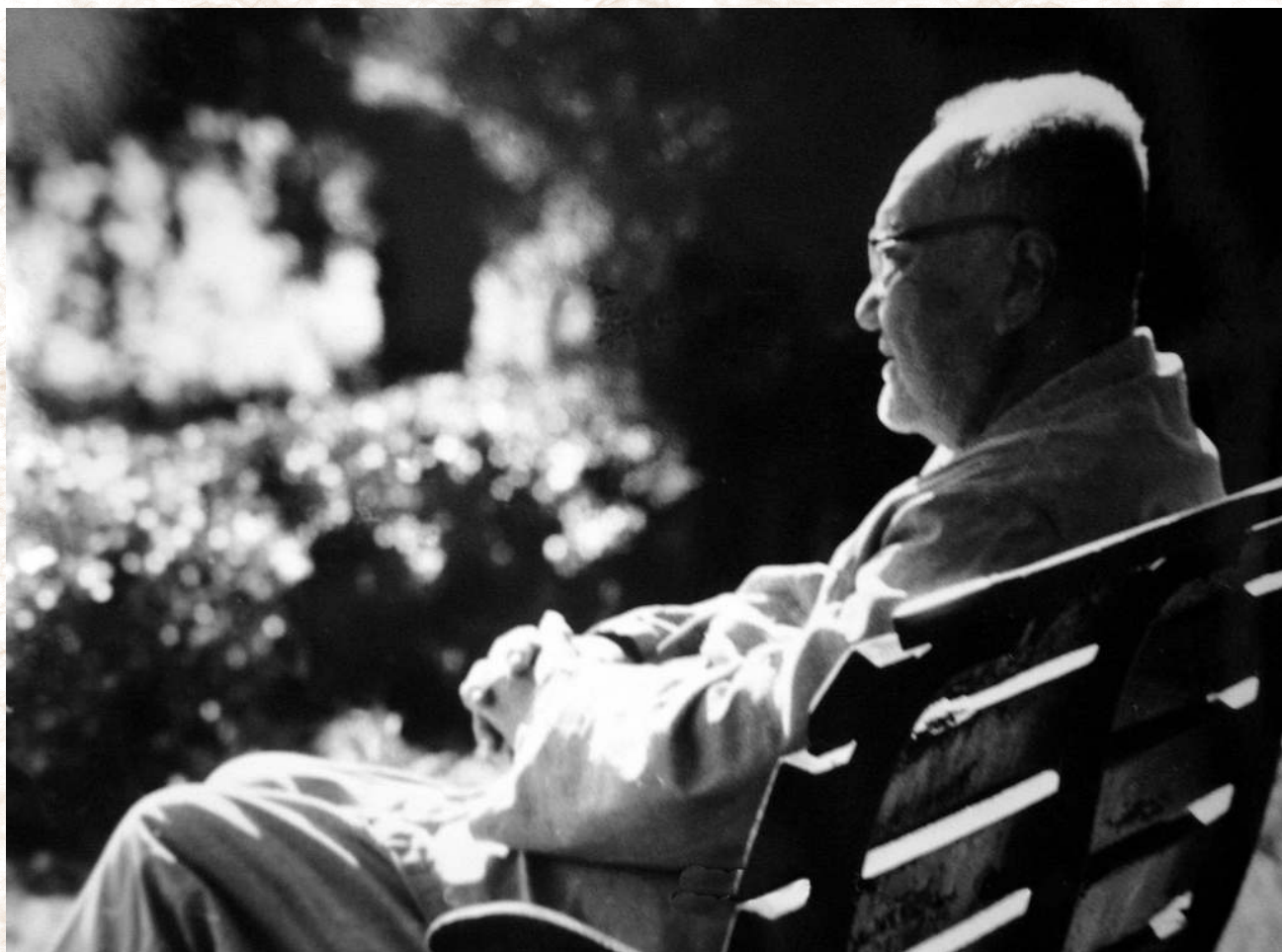
“学为人师，行为世范”的典范蒋硕民教授

蒋迅

欧阳顺湘博士在《数学文化》第3卷第3期里有一篇非常精采的文章“最美的数学就如文学”，其中提到一位受哥廷根的两位中国学生——魏时珍和朱公谨影响而赴哥廷根随柯朗做博士论文的人，他就是原北师大著名教授蒋硕民（1913年3月11日 - 1992年5月11日）。2013年3月11日是蒋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日子。说起蒋硕民教授，可能现在的年轻数学家们大多不知道他。根据互动百科，“蒋硕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，研究方向是偏微分方程、近世代数。蒋硕民是中国偏微分方程学科的先行者，近世代数早期介绍者之一。他集中西学问于一身，培养了众多的优秀人才，把毕生的精力全部贡献给了教育事业。”（材料取自程民德先生主编的《中国现代数学家传》第三卷）这样的论述比较精

辟地概括了他的一生。

蒋硕民先生1913年3月11日生于北京一个民主革命派的家族。父亲蒋作宾，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，后参加辛亥革命。母亲张宏楚，是辛亥革命志士张通典之女。蒋硕民先生1928年进入世界有名的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。在德国，他受教于希尔伯特（D. Hilbert）、柯朗、埃米·诺特、赫格洛兹、冯·诺依曼、雷立奇、范·德·瓦尔登教授等大数学家。蒋硕民先生的博士导师原为柯朗。他得到柯朗所拟定的题目后，经过将近一个学期的时间，证出该题是错误的，才又换为偏微分方程中层次相当高的“双元 N 次偏微分方程的一个混合边值问题”。在二战期间，柯朗因是犹太人被一些走了极端的学生赶出德国。他不得不转从雷立奇教授。



蒋硕民先生在北师大校园休息（李小烈摄影，陈黎提供）

1934 年秋，雷立奇被聘为马堡大学数学系教授，蒋硕民先生随其前往，一方面撰写论文，一方面帮助雷立奇做些工作，写讲义，还上讲台解释。1935 年 6 月 19 日他获得马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，同年回国。

回国后，蒋硕民任南开大学数学系教授，年仅 22 岁。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，南开大学被迫迁往长沙，不久迁往云南昆明，组成西南联合大学。蒋先生随学校辗转到了昆明。1940-1941 年，日本侵略军大轰炸西南联大，一年级被迫搬到四川叙永去设立分校。蒋硕民、程毓淮和刘晋年三位教授前往并同住一单身教授房间。1941-1945 年，他转往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数学系。1945-1946 年，他回到西南联大。这一段时间里，他先后教了很多课程：微积分、高等代数、近世代数、微分方程论、偏微分方程论及变分法。抗战胜利后，联大的三所学校复原，



蒋硕民先生和蒋夫人杨维仪的合影

蒋先生因为原来是南开聘请的，有约在身，故前往天津南开任职。1947年蒋硕民先生由南开大学休假去纽约柯朗研究所进修。1948年再次回国，当时西南联大给云南留下了一个昆明师院，由杨武之教授任数学系主任。杨武之力邀蒋先生留下任代系主任，于是蒋先生向南开大学请了一年假到昆明师院，后来新中国政府成立，冻结人才，他没能再回到南开。1954年全国院系大调整的时候，蒋硕民先生调到北京师范大学任二级教授，直到退休。当时教育部的人似乎不知道有这样一位资历颇为丰富的数学家。蒋先生身为昆明师院的教务长到教育部开会，很多大数学家都与蒋先生寒暄，而且中山大学和南开大学都邀请他去，这才意识到这个人很了得。当时那两所大学都归高教部管，而教育部不愿意把他让给高教部管辖的学校。于是一个调令让他10天内从昆明到北京，任北师大二级教授。后来他的女儿回忆到，一家人从昆明到北京，光汽车就坐了七八天。在北京师大，他先后主办了分析数学方向的青年教师讨论班、进修班、研究生班及助教班等，担负起了培养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的工作。此外，他还为研究生班、助教班系统讲授实变函数论、常微分方程、偏微分方程等课程。1992年5月11日，他在北京去世。

蒋硕民先生身体一直不好，文革期间又被迫做他不能承受的体力劳动，到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进校读书的时候，蒋先生已经因身体原因不能站在讲台上上课了。记得那时我们同学一起到图书馆前散步，时常看到蒋先生坐在椅子上晒太阳。我们也就利用这个机会上去与他聊天。77级有一些同学因为在文革期间自觉学习了英语，学校允许他们免修英语。于是数学系领导找到蒋先生，希望他能为这些同学开一个数学英语学习小组，他愉快地接受了。课堂就设在他的家里。这是他最后一次为学生上课，而且不是一门正式的数学课，但他仍然认真准备。上课时，同学们都聚集到他的家里。虽然他是留学德国的，但他的英语、法语也同样精通，甚至能阅读英、法文的文学名著。1950年，他旁听俄语课，一年后就阅读俄文文献。

到大学毕业时，其中一位同学在申请留学时请蒋先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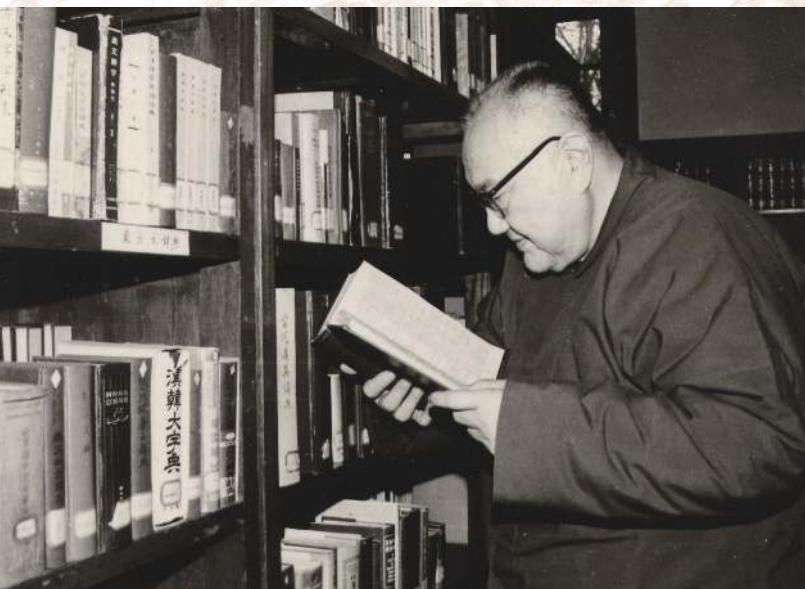


蒋先生和北师大数学系分析教研室的老师们



蒋先生和洪良辰、周美柯、李艾青、卮中丹、洪吉昌老师（从左到右）

写推荐信。蒋先生让他先用英文写了一个自我介绍。这位同学的英语虽然还不错，但写出来的东西还是跟西方人的写法有很大差距，比如中式倒装句，用词不当，从句过长等等。没有想到蒋先生亲笔为他把这篇短文重写了一遍，而且一段一段地告诉他为什么这么修改。1986年，这位获得密西根州立大学助学金并将要赴美留学的学生去向他告别。蒋先生高兴地介绍了这个学校，就好像他在那里生活过一样。后来，蒋先生把他手写的推荐信交给了这位同学，我也得到了一份



蒋先生在系资料室参阅文献



蒋先生在参加会议

复印件。它印证了高枚老师在他的文章“高山仰止——忆蒋硕民师”中对蒋先生“清丽的小字”的描述。

蒋先生在现在的数学界的知名度不高，但是老一辈数学家都知道他。1985年7月4日，当代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到北京师大作“微分几何50年（1935-1985）”的学术报告。在我的印象中这是陈先生唯一一次到北京师大演讲，据说是因为蒋先生的邀请。在会上，他一开始就专门提到了蒋先生。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院士、蒋先生在哥廷根的同学程毓

淮博士也曾应蒋先生的邀请到北京师大做过学术报告。我手中还有一份田方增先生手写的回忆蒋先生的资料，不知道是否发表过。徐利治先生在一次访谈中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：“在西南联大数学系，除了华罗庚、陈省身、许宝騄这“数学三杰”十分突出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比较突出的数学人才？”徐先生说：“应该提到的是两位从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回来的教授，一个是程毓淮，另一个是蒋硕民。……蒋先生后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工作。程先生后来去了美国，十五年前回国时，我在长春还接待过他。听说，他现在也去世了。这两个人学问很好，但不大写文章。因为他们不怎么写文章，也就没有什么名气，报纸也不会宣传。他们在哥廷根大学听过希尔伯特（David Hilbert, 1862-1943）和柯朗（Richard Courant, 1888-1972）的课。哥廷根大学当时是世界数学的一个中心。”

蒋先生与夫人杨维仪先生是在法国（不是在西南联大）认识的。杨先生早年留学法国，抗日战争开始后回国。1955年到北京大学西语系工作，先后任法语讲师、副教授、教授。杨先生有时候显得对蒋先生厉害了点。蒋先生有糖尿病但又喜欢吃糖。记得有一次蒋先生刚刚拿起了一块糖，一下子被杨先生抢了过去。但谁都知道这是杨先生对他的细心关照。她一直是蒋先生的贤内助。我在美国留学期间需要学习法语。那时候互联网远没有现在发达，杨先生立即把她为北大编写的法语课本送给了我，还为我专门录制了两盒磁带，把其中全部课文都朗读了一遍。1994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她的电话，原来她要到华盛顿特区去旅游，希望见我一面。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。几天之后，杨先生在返回中国的国际航班上突发脑溢血，在东京病逝。

我在高枚老师的文章中读到“蒋师一直保持着自己在哥大求学时的作业，其中就有一些是经外尔（H. Weyl）批改并且在卷后签名的”。高枚老师在回忆录里写了很多关于蒋先生书籍的片段。在文革期间，蒋先生一家“只留得一大一小两间。没有地方安放书橱，又不忍将藏书作废纸处理。于是，依著一面墙，将书一层一层摆起来直至屋顶，形成了一堵书墙”。“先生拣出几本书让我带回阅读，其中有纽约大学数学研究所新近寄赠的英文版《希尔伯特传》。此书后来有了中译本，可惜没有收入原书卷首许多珍贵照片。”在他去世以后，杨先生把这些书籍和笔记都捐献给了北京师大数学系。联想到高枚老师的记述，我猜想那里面很可能有大数学家留下来的笔记呢。记得当时北师大数学系把这些书都存放在资料室。如果这些书籍还在的话，也许里面会有很多珍贵的文物。但愿数学系（现改名为数学学院）被搬出数学楼时，这些